

# 史诗卷“概述”的撰写原则

□高荷红



“史诗是一种古老的源远流长的韵体叙事文学样式。”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卷》过程中,发现省卷工作人员询问最多... 在审读多省史诗分卷“概述”时也有所体现。那么,该如何撰写“概述”呢?

## 厘清史诗概念及其传统

中国各民族史诗形态复杂,按传承和流布的地域和族群、历史民族地理区... 北方民族主要以长篇英雄史诗见长,南方民族史诗则多为中、小型的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它们分别形成“北方英雄史诗带”和“南方民族史诗带”。“三大史诗”以其丰富的活态传统无可争辩地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史诗传统,《格萨(斯)尔》堪称是口传史诗的样本。

“南方史诗研究广泛涉及彝、苗、壮、傣等数十个民族的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以及以不同方式统合创世、迁徙和英雄史诗内容的复合型史诗... 一同构成了丰富的南方史诗群的整体样貌,拓展了世界史诗宝库的谱系。在南方少数民族史诗传统中,创世史诗令人叹为观止。彝、哈尼、纳西、白、拉祜、傣、羌、普米、景颇、阿昌、德昂、傣、布依、水、苗、瑶、侗、土家、壮等民族都流传着以创世神话为基本内容,以天地、万物、人类、社会、文化之起源、演变、发展为叙述程式的本民族或本支系的创世史诗。由于这类史诗的主要特征是由众多神话连缀而成,它们构筑起颇具特色的韵文体神圣性叙事系统,或曰形式上是韵文体,内容上是体系化的神话叙事,故而一度被一些学者称作“神话史诗”。”这种现象使得具体文本或被视为神话或被视为史诗,历代学者对文本的不同认知给当下史诗文本选择和编纂增加难度,因此,学界亟需藉《大系》编纂之机,正本清源。

北方史诗类型相对简单,但涉及具体文本,偶尔也会有如《天宫大战》般可被称为“神话史诗”的文本。这时,我们可以“中国的史诗传统”中判断史诗的“八个尺度”作为评判标准:(1)诗体的或散韵兼行的;(2)叙事的;(3)英雄的;(4)传奇性的;

(5)鸿篇巨制或规模宏大;(6)包含着多重文类属性及文本间有着互文性关联;(7)具有多重功能;(8)在特定文化和传统的限度内传播。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天宫大战》符合这八个尺度,特别是该文本与“窝车库乌勒本”《乌布西奔妈妈》《恩切布库》《奥克敦妈妈》等文本间的互文性关联,因此,我们将之视为史诗,并将其统一纳入位于北方史诗带东段的满-通古斯英雄史诗群。这一史诗群中还有赫哲族的“伊玛堪”、鄂伦春族的“摩苏昆”。“伊玛堪”“摩苏昆”都是说唱传统,从文本内容上可分为几类,学者通常将围绕“莫日根”(勇士、英雄、神箭手)展开叙事的《满都莫日根》《安徒莫日根》《松香德都》《希尔达日莫日根》《爱珠力莫日根》《英雄格帕欠》等视为史诗。但如反映婚姻爱情、社会生活主题的文本则很难被视为史诗。

因此,撰写“概述”及择选文本时,一定要遵循“八个尺度”,将易混淆的文本梳理清楚,这要求撰写者能够较为娴熟地掌握该文类的学术史。史诗在不同民族传统中,都有其惯有的称呼,满-通古斯语族史诗中的多个传统即如此,因此还需结合民族语来解析。

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已然出现若干学术转向:从文本走向兼顾田野,从传统走向兼顾传承,从集体性走向兼顾个人才艺,从传承人走向兼顾受众,从“他观”走向兼顾“自观”,从目治之学走向兼顾耳治之学,从描述和评价具体史诗和史诗诗走向诗学理论体系的建设。

史诗研究的这一转向,也应将其纳入本民族史诗“概述”写作中,史诗研究不仅仅关注文本的搜集整理,而是“与相关族群和社区的人生礼仪、节日庆典、民间信仰和宗教仪式等民俗生活及其文化空间密不可分”的史诗传统。

## 史诗文本的全方位解读

“中国的史诗传统”从多个维度介绍了多种多样的史诗文本形态:以载体介质论,有手抄本、木刻本、石印本、现代印刷本等;以记录手段论,有记忆写本、口述记录本、汉字记音本、录音誊写本、音/视频实录本等;以学术参与论,有翻译本、科学资料本、整理本、校注本、精选本、双语对照本乃至四行对译

本;以传播-接受形态论,则有口头文本或口传文本,源于口头的文本或与口传有关的文本,以及以传统为导向的文本;以解读方式论,有口头演述本、音声文本、往昔的音声文本,以及书面口头文本等。

一方面,就依然处于活形态传承之中的史诗文本而言,试图建构或者追求作家文学观念中所谓“权威本”或“规范本”则是与民间口头演述传统不相适应的,往往也不现实;另一方面,史诗又不会无限制地变化,历史悠久的演述传统都拥有内在的机制,制约着文本的变异方向和变异限度,尤其是史诗的基干情节、程式与演述语境都有着稳固的传统制约,杰出的史诗歌手往往也是在传统叙事的框架中来完成自己的即兴创作的。

因此,撰写“概述”时,必须全方位了解该民族史诗文本的情况,条分缕析将其梳理清楚。有的民族史诗传统历史悠久,就需要分门别类,切忌挂一漏万;有的民族史诗搜集整理历史仅有几十年,且主要以录音誊写本为主,如鄂伦春族“摩苏昆”;有的史诗文本曾有多位歌手的演述本,最好也要一一列出,如葛德胜演述的《希尔达鲁莫日根》最长,但其他歌手也曾

# 《大系》中民间说书的独特性

□耿柳

中国传统民间说书,在我国北方以评书、鼓书两种形式为主,评鼓书之间也互相借鉴,有的书目评鼓书兼而有之。

我国北方地区少数民族部落在文字尚未形成之前,就流行老人们说历史、讲故事的形式。以说唱形式讲遗闻、说神话、诵先民业绩等民间口头文学表现形式,孕育了中国说书艺术。追其根,从百姓中来;溯其源,则荒古已萌芽;探其流,古今为之击掌者数之不尽。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均先有说书,后才由文人写成章回小说,小说问世后,又被说书艺人采用,经过世代艺人不断加工、丰富,成为传统书目。传统说书众声数陈,重国家、尚民族、爱黎庶、睦友邦、赞善良、讲情义、扬美德、惩邪恶,千百年来在传承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建构社会美德和培育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已经出版的8卷说唱卷中,均有民间说书人选。内蒙古卷收有评书《刘大私人私访归化城》;安徽卷收有淮河琴书《王华买父》、淮北大鼓《前后七国》、安徽评书《大红袍》;辽宁卷共出版4卷,分别收有长篇评书《隋唐演义》、东北大鼓书《薛丁山与樊梨花》《回杯记》、西河大鼓书《潘杨讼》《小将呼延庆》及短篇评书《海瑞办严嵩》《哪吒闹海》《长坂坡》《鸿门宴》等;山东卷两卷收有山东琴书《白蛇传》《罗鞋记》等。这些优秀的传统书目只是我国传统说书的零光片羽。

一人一扇一醒木,千古兴衰口中诉。评书艺术使人们收获知识,增长智慧,既讲述史实,也刻画裨官野史和民间传说中的鲜活人物。老百姓对于历史知识的了解,多半是通过听书看戏来完成的。普通百姓宁愿相信说书先生所讲的忠奸善恶、人间悲欢、世态炎凉,而不愿探究《史记》《资治通鉴》等各种史料所记载的史实,体现了艺术表现生活从历史真实到艺术真实的传播规律。比如百姓所解读的唐代史,并不是通过《新唐书》《旧唐书》,而是通过《隋唐演义》《响马传》这些传统评书或戏曲来了解的;对宋代历史的知晓,并不是通过《宋史》,而是通过《杨家将》《岳飞传》这些传统表演艺术来完成的。说书作为扎根深、影响广的说唱艺术,它独具风采,始终拥有大批观众。我国民间说书名家辈出,书目繁多,大部分是几代人不断完善的结晶,甚至有的书目经过十几代评书艺人雕琢和演出实践,还有的书目是说书家付出了毕生心血而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民间说书有多个曲种是国家级保护项目,《大系》与非遗对说书艺术的保护不同。非遗注重活态传承,没有代表性传承人是无法进入传承名录的。《大系》则更注重其艺术本身的代表性,且在收录文本的同时,增加了艺人小传、流传时间地点等信息,立体化地展示和保存文化成果。《大系》与其他出版物相比,更注重保留说书的方言、地域特色。以往说书类出版物,在选择作品上常常以能否盈利为主,有的书目为了适应读者的需求,将口语化、大众化、地域化的生动语言转化为普通话或书面语言,还有的出版物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将鼓书改为评书,使其艺术色彩大为减弱。

因此,在浩瀚的说唱作品中,入选《大系》作品的选择尤为关键。以辽宁卷为例,只有具有“优、特、独、全、珍”特色的传统说书方可逐次入卷。优,即优秀。说书家的代表书目有田连元的评书《隋唐演义》、单田芳的评书《明英烈》等。特,即艺术特点突出。如陈青远的东北大鼓书《薛丁山与樊梨花》。独,即独家书,一家父子或者师徒传承三代。如石长岭的《六部春秋》,包括《左传春秋》《吴越春秋》《英烈春秋》《金盒春秋》《走马春秋》《锋剑春秋》六部系列书。部分书目也有其他说书家会说,但全本只有石家传人石连璧、石连君、石印红继承了下來。全,即故事最全,最完整。如《杨家将九代英雄传》。小说《北宋志传》只写杨继业、杨延昭、杨宗保三代英雄,《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中续写杨文广、杨怀玉两代英雄。北方说书中,前有火山王杨衮,后有杨士瀚、杨金豹、杨满堂或杨再兴,歌颂杨家将九代英雄。珍,即面临失传,版本珍贵。如聂田盛的《五女七贞》(八集),前三集很多说书家都说过,后五集是聂本独有,其中有辽、吉、黑各地发生的故事,极具地域特色。

有的书以上五大特色都具备,但是却一直没有文本出版。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为说书家对文本的整理要求较高,以至于进度过慢,错过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评书出版高峰;有的是书目冷门,出版社出于难以盈利而放弃;还有的是说书人不愿意出版,怕公开文本,被同行“偷艺”。

对传统说书书目的搜集入卷,是一件具有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事情。《大系》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保留其民间性、地域性等显著特点,在作品梳理、文字加工等方面,遵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剔除糟粕、保存精华和尊重历史、尊重民间说书艺术规律的原则,保证了作品质量和艺术价值。

(作者系辽宁省曲协副主席,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民间说唱”组专家)



# 重视古老灾难传说的当代价值

——以剑川灾难传说为例

□毕旭玲

灾难传说是人类传说中最古老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中不仅包含了对真实发生过的巨大灾难的集体记忆,也蕴藏了防灾、减灾、救灾的传统经验和智慧,更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是宝贵的文化和精神财富。此外,古人遭遇过不少灾害依然还是当代人类社会难以解决与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灾难传说因此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剑川县隶属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厚重的文化传统,于2023年3月15日被国务院正式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剑川民众创造了包括灾难传说在内的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从主题上看,剑川灾难传说包括水旱灾难传说、瘟疫传说与地震传说等多种类型,其中尤以水灾传说与瘟疫传说多见。

《雕龙记》是代表性的剑川水灾传说,也是白族传说中知名度最高的叙事之一。195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曾根据该传说拍摄了同名木偶动画片。《雕龙记》讲述说:剑川木匠杨师傅携子返乡途中路过一处龙潭。龙潭中的一条母猪龙每隔三年便会制造一场大洪水,受灾的白族人民只能靠吃草根树皮为生。母猪龙忌讳金属器皿,杨师傅的儿子用铜锅舀水时被母猪龙拖入水潭,丢了性命。为替子报仇和为民除害,他决定雕刻出神龙,让其打败母猪龙。历经几次失败之后,杨师傅最终雕出了一大八小九条木龙,并诵经使其具有神力。九龙打败了母猪龙,三年一次的大洪水就此消歇了。《独眼墨斗山龙》也是一则代表性的水灾传说,讲述道:墨斗山旁的村子里有一位技艺高超的杨木匠,杨木匠新婚不久就出了远门。墨斗山龙潭的龙王三太子喜欢淫人妻女,化作少年调戏了新媳妇,还年年兴风作浪,毁坏良田,冲倒房屋。杨木匠归家后雕刻了两条木龙,念诵《木经》使其变为铁甲真龙。铁甲龙打败了三太子,此后水淹良田之事不再发生。

上述水灾传说的产生有其客观原因。剑川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峦起伏,河川交错,属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八大片区的老君山片区,较易发生水灾。据不完全统计,仅清代有记录的大水灾就不少于9次,比如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七八月间的大雨,淹没剑川大量田地,民众多溺死。到了九月,剑川再次发生由夜雨引发的山崩,压死伐木工十多人。以《雕龙记》和《独眼墨斗山龙》为代表的灾难传说正是对这些灾难的集体记忆。两则传说都是叙事内容较为复杂的水灾传说,既有对剑川传统木雕技艺的赞扬(剑川木雕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又体现了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经济生产方式的剑川人对龙神的敬畏,还寄予了剑川人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更表现了剑川民众不畏艰险、勇于抗争的精神,是具有多方面价值的经典传说。

《大黑天神的来历》是代表性的剑川瘟疫传说。相传,大黑天神原本是玉帝身边的侍者。三月三日玉帝临朝时,发现不少仙人因仰慕剑川美景而下界游玩。玉帝不能忍受人间脏过天官,就派侍者将瘟药撒到人间,想让剑川人亡畜死,树枯水干。侍者不忍心,决定牺牲自己,拯救一方生灵,于是喝下瘟药,很快其面庞和四肢都被烧黑,浑身肿大流脓,栽下了云头。太上老君托梦诉说了缘由,民众十分感动,为侍者立庙,将他奉为本主神,因不知道他的名字,就尊为“大黑天神”。本主神是白族特有的一种民间信仰神祇,意为“本境保护神”。该传说采自剑川上河村,实际上,大黑天神在大理州许多村镇被奉为本主神,因此《大黑天神的来历》也在大理各地广泛传播。值得注意的是,传说将引发瘟疫的原因归为玉帝对人间美好生活的嫉恨,体现了剑川民众强烈的文化自信与地方自豪感。

《龙头三弦的来历》和《石宝灵泉的传说》也是代表性的瘟疫传说。前者讲述道:古时,远方飞来一只金鸡爱上了剑川石宝山的秀丽风光。它在栖宿山上唱时辰、报节气,白族民众按时播种、收割,年年都能获得丰收。金鸡还教民众唱白族调。后来,一条凶恶的黑龙闯入,要与金鸡争夺宝地,还给白族民众带来了瘟疫。最后,民众帮助金鸡战胜了恶龙,金鸡教



民众以恶龙筋骨制作龙头三弦琴。后者讲述说:唐代剑川一位名叫张宝泉的名医家隐居深山。某一年剑川爆发瘟疫,死者以千计,张宝泉四处寻找救命草药而不得,便在宝相寺后山的悬崖处长叹,发誓愿以己身化清泉,以根治人间瘴气之疾。言毕,张宝泉化为清泉,泉水流入剑川坝子,民众饮了泉水,很快恢复了健康。这两则传说表现了剑川民众对瘟疫防治的某些规律性认知,比如《龙头三弦的来历》阐述了农业灾害的发生与疫病流行之间的关系,又如《石宝灵泉的传说》讲述了清洁水源对阻断疫病传播的重要作用。

上述这些瘟疫传说的产生也有其客观原因。剑川县山区面积占90%以上,森林覆盖率高,这些山区也是我国野鼠鼠疫的重要疫源地,18-20世纪曾多次爆发鼠疫大流行。比如清代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1758-1759),剑川、丽江一代鼠疫流行,死者达数千人。瘟疫传说不仅是对史上疫病的集体记忆,也传承了剑川民众在与疫病斗争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智慧和经验,还表现了剑川人对人类最终能够战胜疫病的乐观心态,更歌颂了在与疫病斗争过程中英勇牺牲的先辈及其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大黑天神与名医张宝泉便是这些英雄的代表,因此具有相当重要的当代价值。

防灾、减灾、救灾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灾难传说传承的经验和智慧,体现出的精神力量和乐观心态是当代人类灾变避难的重要文化和精神源泉,因此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中,应该加强对灾难传说的收集、整理和研究,重视其当代价值。首先,可以考虑在灾难传说集中的地方分卷中增加“灾难传说”的次级分类;其次,在收录灾难传说的同时,也要及时总结和梳理本地灾难传说的特点和价值,尤其是对当代防灾、减灾、救灾有益的科学与认知与精神价值;第三,还应当通过种种途径和方法增强古老灾难传说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以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的科学知识,增强人类终将战胜灾害的信心,帮助民众应对可能到来的自然灾害。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院民俗研究室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论评论专委会副主任,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民间传说”组专家)

文艺报 中国民协 合办